

# 世界汉外双语词典史的缘起<sup>\*</sup>

杨慧玲

**摘 要** 文章介绍了编于菲律宾的《汉西辞典》、巴达维亚的荷—拉—汉词典,入华耶稣会士的汉葡、葡汉词典等早期汉外双语词典手稿的基本情况,分析了缘起阶段的汉外双语词典的共同特点。

**关键词** 手稿 汉外词典 汉外词典史 缘起 特点

历史长河中,中国和欧洲由于语言文字的不同、时代背景的差异,辞书传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轨迹。在中国传统辞书中,字书以解说文字形、音、义为目的,是中国古代传统辞书中类别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支。而从欧洲的辞书传统来看,欧洲词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双语辞典为主。随着 16、17 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新独立的欧洲各国为了确立自己的民族语言,通过国家行为创立国家学院(National Academy),统一或规范民族语言,在欧洲民族语言规范化进程中,单语辞书逐渐成为重要的辞书种类(Collison 1982)。1492 年以哥伦布的航海探险为标志,揭开了欧洲殖民、宗教势力进入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序幕,也为世界双语词典增添了新的成员——欧洲语言与非洲语言、美洲语言、亚洲语言对照的双语词典。

作为中世纪欧洲知识和教育垄断者的基督教教会和传教士,

<sup>\*</sup> 此项目获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

有着悠久的语言学习和词典编纂传统。随同欧洲殖民者进入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传教士,自 16 世纪与中国语言、文化、宗教有了一次较为密切的接触。笔者在此将要探讨中、欧辞书传统在历史上的最初相遇。

## 一、赴菲律宾传教士的汉西词典手稿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的大航海改变了近代世界的格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基督教精神及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积极推行海外扩张,葡萄牙向东占据了美洲的巴西,印度的果阿,马来半岛的马六甲、苏门答腊、爪哇,在中国盘踞澳门。西班牙向西,得到了古巴、菲律宾群岛等地,企图以此为跳板进入中国。<sup>[1]</sup>

天主教内材料记载,随同 1564 年西班牙远征军第一批定居菲律宾的天主教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da, 1533—1578)是第一部由欧洲人编纂的汉语词典(*Arte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的作者(Streit 1929:311)。然而,从拉达之后菲律宾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情况来看,拉达的汉语词典手稿似乎并未流传或被其他人使用,拉达编纂了第一部汉语词典的说法仍缺乏实据。

西班牙殖民者和天主教传教士与在菲律宾定居的华人及往来中菲两地的华商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据载,马尼拉城内中国人最集中的地方被划分在道明会的传教区域内,因此,道明会神父为了归化菲律宾的中国人而学习汉语。据龙彼得(Van der Loon 1966—1967)研究,16 世纪末菲律宾的天主教神父们主要学习和使用客家方言。第一位在菲律宾向华人传教的道明会士 Miguel de Benavides(1552—1605)于 1587 年进入菲律宾马尼拉,龙彼得认为 Miguel de Benavides 神父虽然掌握了客家方言,但是他读写汉语的能力极为有限,另一位传教士高母羨(Juan Cobo, 1546—1592)不仅掌握了汉语口语,还能够阅读中文书籍并用中文写作。

教内学者根据高母羨及其他人的通信,认为高母羨编纂了一部汉语词典,然而也有人认为高母羨编写的是一部汉语语法书。<sup>[2]</sup>这当中存在一个问题:当时传教士们给欧洲总会或教友的通信中常常提到他们正在编写汉语词典或者语法书,但是,他们是否完成了汉语词典或语法书,是否将汉语词典和语法书公开,后人并不清楚,除非在原始文献方面有重大突破,否则多数都无法证实。

一份保存至今的 16 世纪末汉西词典手稿是了解早期菲律宾汉外双语词典编纂传统的窗口。这份汉西词典手稿现藏于罗马安吉利卡图书馆(Biblioteca Angelica)。封面上有耶稣会神父齐瑞诺(Petrus Chirino 音译,1557—1635)为了归化菲律宾的华人而学习汉语,并于 1604 年 3 月 31 日将此词典献给洛卡(Angelo Rocca,1545—1620)的献词。<sup>[3]</sup>



图 1 手稿汉西词典封面及首页(自右向左)

齐瑞诺的词典是当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唯一一部早期菲律宾汉语学习的手稿文献。这份汉语—西班牙语词典手稿共有 83 双页,每页两面,基本上都是单面写字,个别页码双面都有内容。汉西手稿词典以汉字、汉语词语和句子为中心,前几页是在汉字下标注罗

马字母注音,在汉字右边标注相应的西班牙语单词;后面部分则注音在左,西班牙语对应词在右。手稿词典按传统汉字书写习惯,从上向下竖行书写;从右向左翻页。手稿词典内容的排序稍显混乱,先从“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汉字入手,然后按照类属分类罗列一些常用词,后面逐渐增长至一些常用短句如“照照样做”、“无主意”、“尔要几日用”、“尔要若干工钱”等。最后的长句中间又夹杂几页如“忆着、今即、早间、昨晚、黄昏、明日”之类的词,随后又有几句讨债的对话,反映的是客家方言日常生活口语。

从这个相当原始的双语词典手稿,我们可以了解早期在菲律宾的天主教传教士学习汉语和编纂汉语词典的过程。当中国人指着某一个东西告诉他汉语叫什么,他就用西班牙字母记下中国人的发音,然后写上与之对应的西班牙语词。手稿词典先从日常用品及生活中常用的名词及汉语数字开始,逐渐积累汉语词汇,之后扩展到日常生活和贸易常用的简单表达和短句,然后是长句。在词典手稿编写过程中,中国人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不仅词典的汉字全部由中国人书写,从词典的编排方法和内容来看,也都是以中国人为主导的。这部手稿词典以中国五行“金、木、水、火、土”为部首构成的字开始,分门别类地列举动物、植物、日常用语,同时还收入了汉语蒙童教材中的近义词、反义词对照表,强化内容的语义关联性,便于记忆。手稿词典中没有出现任何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也没有收入任何与欧洲事物相关联的新词,这些都说明这是以中国人为主、以天主教传教士为辅编写的一份手稿词典。

## 二、入华耶稣会士编写的早期葡汉、汉葡双语词典

自1560年第一批耶稣会士到澳门定居并展开传教及其他活动后,耶稣会士陆续来到澳门。当时居住在澳门的耶稣会神父们的汉语水平非常有限,并未意识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首先进入中国并学习汉语的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紧

随其后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他们二人合作编写了一部葡汉词典(约 1583—1588)。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词典手稿,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存放了三百多年,其作者和编纂时间不为人知,直到德礼贤(Pasquale D'Elia, 1890—1963)1934年发现了这部手稿,鉴别这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的作品。1989年杨福绵又全面研究了这部葡汉词典手稿。



图2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词典手稿

《葡汉词典》共收入约六千多个葡语词条,按葡语词条首字母A—Z排序。第一竖行的葡萄牙文词目既有单词,又有短语。第二竖行是罗马注音,罗明坚书写。杨福绵对罗马注音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发现罗明坚常常是客观地记录了中国教师的发音,因此这些罗马注音中掺杂了中国教师的方言音。第三竖行是对应的汉语词或短语,是由中国人书写。第四竖行是意大利语的对应词,这一

部分极少,仅 32a—34a 有利玛窦书写的意大利语对应词。《葡汉词典》收录的词和短语既有明朝官话,也有南方方言,编纂这部词典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明朝官话口语。遗憾的是,这部词典并未完成。

杨福绵还澄清了另一个问题,就是除了罗明坚与利玛窦在肇庆合编的葡汉词典外,利玛窦与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 1560—1640)等人在旅途中还编了一部汉葡词典。<sup>[4]</sup>至今,学者们尚未找到这部汉葡词典。文中提到了北京国家图书馆的一部手稿<sup>[5]</sup>,笔者认为这部汉葡词典抄本的成书时间大约在 17 世纪中后叶。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收藏了一部 17 世纪早期的汉葡词典手稿。这部词典手稿的编号为 Japonica-Sinica IV 7,原封面已经遗失,现内封上粘了不到一寸宽的原封皮的残片,仅存几个烫金字母。耶稣会档案馆对何时更换原封面、原封面上有何内容没有任何记载。查阅《罗马耶稣会档案处藏汉和图书文献目录举要》(*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一书,耶稣会陈绪伦神父鉴别这部汉葡词典的成书时间不早于 1625 年,因为词典中提到了景教碑,而此碑是 1625 年在陕西发现的。此外,这部词典不避清讳,称满族人“虏酋”,其他用词如“东厂、典史、卫所、里长、员领”也都是明代特有的词汇。在 1625 年至明末,编写汉葡词典的耶稣会神父只有费奇观(Gaspar Ferreira, 1571—1649)和曾德昭(Alvarez Semedo, 1585—1658),两人都是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然而,要想进一步确定这部汉葡词典手稿的作者,仅靠一个未完成的抄本和教会记载是无法实现的。

这部汉葡词典手稿字迹工整,从最后几页可明显看出这部手稿词典并未完成。汉葡词典约 1300 页,每页有十竖行,每竖行内有三横行的汉字词目,汉字词目上方标有读音,汉字词目下有葡萄牙文的对应词和注音形式的例词。词典中有空白条目,也有一些条目只有汉字词目而无注音和释义。据初步统计,这部尚未抄完



“羞愧”在“愧”下查找,也可以通过排除法,在“羞”字下找不到而转到“愧”下查找。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各地方言殊异,即使有“官话音”,也不可能像今日的普通话有统一的标准,通过教育和媒体在民众中得以普及。因此,若没有检索表或其他检索方式辅助,按音编排的汉外词典仍会存在使用难的问题。这部词典的词目编排方式对学习汉语有帮助,如果以此词典做教材,通过学习一个核心字,很快就可以掌握它的搭配词和意义,对于扩展词汇量和记忆词汇有促进作用。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汉葡词典的特殊意义在于,利玛窦和郭居静在编写汉葡词典时,有意让所有入华传教士掌握并使用利玛窦、郭居静的最新汉字注音法,承载大量汉字和新注音的汉葡词典被其他耶稣会神父使用并广为流传的可能性极大,那么,继利玛窦之后的耶稣会神父编纂的汉葡词典中必然借鉴且包含了利玛窦汉葡词典的精华。因此,这部手稿词典抄本可以作为了解明末耶稣会汉葡词典传统的一个窗口。

### 三、赴巴达维亚传教士的荷—拉—汉词典手稿

大航海后,葡萄牙人最早发现了通向印度的航线,到达了中国海岸。英国和荷兰在17世纪加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殖民扩张,与西、葡殖民者为争夺海外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凭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实力,荷兰人1603年在菲律宾巴丹建立了第一个贸易基地,1619年占领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第一位到达巴达维亚的荷兰新教传教士赫尔尼俄斯(Justus Heurnius, 1587—1651/2)开创了荷兰人学习汉语和编纂汉语词典的先河。他1624至1632年在巴达维亚传教,为了让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在当地定居并信奉基督教,他对中文产生了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他结识了一名懂拉丁语的中国人,跟随这位中国人学习汉语的同时,编纂了一部荷兰语—拉丁语—汉语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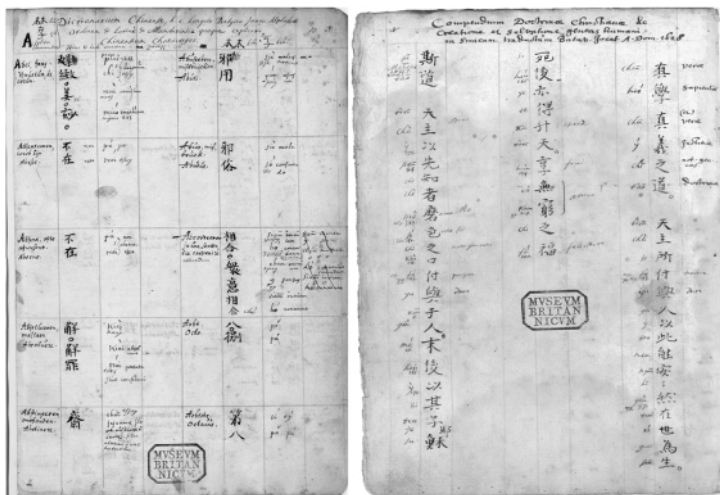


图 4 巴达维亚荷一拉一汉手稿词典正文及附录

赫尔尼俄斯的汉语知识非常贫乏。他编写词典时,先编写荷兰语和拉丁语词条,然后在那个懂拉丁语的中国人的帮助下,把拉丁语译成汉语。他在一封信中提到这名中国合作者当时在巴达维亚做教师,以前曾在澳门接受过教育,因此懂得拉丁语。这部词典是荷兰语—拉丁语—汉语手稿词典,现查明有三个稿本,一个是大英博物馆藏本 Sloane 2746,一个是荷兰莱顿大学藏本 Acad 225,另一个是牛津大学藏本 Marsh 678 and 456。戴闻达(J. J. L. Duyvendak, 1889—1954)考证了词典手稿的作者,对相关人物关系做了阐述。高柏(Koos Kuiper)的研究更进一步,他对这部词典的三个版本、流传、词典文本编写等进行了探讨。<sup>[6]</sup>这部词典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词典正文,第二部分是基督宗教内容附录,第三部分是日常生活文书附录。高柏对词典的一些条目进行了研究,发现一些荷兰词仍没有找到中文对应词;词典中的基督教学术语,经常使用的是从葡萄牙文转写过来的汉字音,如 Baptis-

mum(葡萄牙文 bautismo)巴第斯磨,明显借用了耶稣会的材料。此外,这部词典中和鸡蛋相关的词,四处中竟然三处都有错误,表明在转译过程中,词典作者和中国合作者出现的语言水平和沟通问题。

这部荷一拉一汉词典的附录极为丰富。笔者考察了附录中非基督教义的部分,发现与明清时期中国民间流传的《万宝幼学须知》的内容多有重合。《万宝幼学须知》是一个集蒙童识字、写字、增广见闻、书写日常文书于一体的自学课本,给这些学习材料配上罗马注音和外文释义,堪称最佳的实用汉语学习教材。这样的附录与词典正文查检汉字的功能相结合,就构成了一个词典兼学习教材的综合统一体。

#### 四、萌芽时期汉外双语词典的特点

原本平行发展的欧洲辞书传统和中国辞书传统,随着大航海后欧洲殖民者、商人、传教士的到来,形成了交叉乃至重合的一段词典史。16世纪中叶欧洲入华传教士编写的汉外或外汉双语词典,见证了这段独特的双语词典史。萌芽时期的汉外双语词典,体现出以下特点:

##### 1. 根据传教需求选择学习的目标语言。

菲律宾的天主教传教士多选择了当地华人的语言——客家话和漳州方言,而在华耶稣会士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官话。其他入华托钵修会如道明会、方济各会曾经经历过从方言到官话的转变,最终,汉语官话成为大多数在华天主教士的共同选择。

##### 2. 汉字注音方案的沿承。

从罗明坚尝试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开始,经利玛窦、郭居静等人的改良,利玛窦等人在汉葡词典中已经可以利用罗马字母注音方案。利玛窦还下令要所有的在华耶稣会士学习并使用他们制定的那套注音方案,目的在于保持罗马字母注音方案的一致性。

1626 年出版的《西儒耳目资》，沿承了前耶稣会士利玛窦、郭居静等人的注音方案，同时在中国著名学者王徵、吕维祺等人的帮助下，进一步统一了罗马字母注音方案。不仅在华耶稣会士使用这套罗马字母注音方案，万济国的注音方案与《西儒耳目资》方案的相似性表明，其他入华修会也借鉴使用了耶稣会士的注音方案。

### 3. 确立了字母排序法为主的双语词典编排方法。

虽然赴菲律宾传教士编写的汉西词典手稿是按主题编排的，然而，大多数双语词典手稿都采用了字母排序法。外汉词典的字母排序法沿袭欧洲辞书传统的主流做法，而在汉外词典中实现字母排序却是一个创新。

中国传统的辞书排序方式以部首排序法为主，也有按音排序的音韵类辞书，但是这两种检索方式对初学汉语的欧洲传教士来说都不易使用。使用部首排序法的字典，只能解决使用者阅读中遇到的生字。使用者必须熟知汉字的构字规则，还需要有相当的识字量才能使用这类字典。按音排序并附有简单字义解释的中国音韵类辞书，也必须掌握音韵学知识和相当数量的汉字才能使用，连中国初学者都很难使用韵书类辞书。因此，入华初期的欧洲传教士并不依赖中国辞书，通常也不采用中国辞书的编排方法。从词典内容上看，中国辞书往往收入书面语字词并解释其在书面语中的含义，选取例证也有崇古倾向，不能满足刚进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对汉语学习的需求。这些入华传教士来到陌生的国度，需要能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基本“口语”表达类工具书，其次才是通过书面语或口语了解中国风土人情，最终要达到用汉语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目的。入华初期的欧洲传教士最需要的是适合初学者用的双语对照的“汉语口语词典”，同时，汉外词典还必须方便检索和使用，对字词和文化的解说也必须使用入华传教士看得懂的语言。在生活中，入华传教士经常听到或者读到一些不懂的汉字或句子，这种情况刺激了他们对汉外词典的需求，激发了此类词典

的编写。

由于从第一位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时代开始,在华传教士之间就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汉字注音方案,因此,早期词典编者利用相对统一的汉字注音方案开创了汉外词典的字母排序法,解决了欧洲人查阅汉外词典的检索问题。利玛窦与其他人合作编写的汉葡词典开启了汉外双语词典的新时代。

#### 4. 收词量和译义等方面的发展。

早期欧汉词典或汉欧词典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应词形式的欧洲语言和汉语都是以表达为主的对应,是既有字、词,也有短语形式的对应。

从收词量来看,即使是罗明坚和利玛窦最初编写的葡汉词典,在当时很多葡语词仍找不到汉语对应词的情况下,词典的收词量也有五六千条,一些葡语词目后还有两三个同义或近义对应词。相比之下,菲律宾的汉西词典手稿以及巴达维亚的荷一拉一汉词典手稿的收词量不如在华天主教士编写的词典内容丰富,然而,这两部词典都收入了一些对话或其他材料,尤其是荷一拉一汉词典还有百科全书式的附录。

汉外或外汉双语词典中对汉字或词语的译义,多源自他们生活中的积累或者是向身边中国人咨询完成的。入华欧洲传教士在学习汉语之初,对中国助手或教师有一定的依赖性,这也是双语词典萌芽阶段的必经之途。

笔者对 17 世纪的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荷兰文等欧洲文字没有深入研究,无法深究这些早期汉外词典手稿中是否都存在这样转译的情况。从历史背景来看,作为汉语初学者的欧洲传教士编写这样的双语词典,都有中国合作者,他们之间或许可以直接沟通,或许要以其他语言为媒介沟通,中国合作者的参与程度肯定也存在一定差异。在以往记录中,中国合作者往往被忽视,著者名下只有入华传教士的名字。在没有作者署名以及知识产权概念的那

个时代,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虽然我们今天很难考证这些中国作者或合作者的姓名,但是应该清楚,在汉外双语词典史上曾经有这样一批匿名中国合作者的存在,他们为汉外双语词典的编纂做出了贡献。

#### 附 注

[1] 有关葡萄牙、西班牙来到中国的早期历史参阅:黄鸿钊主编. 中葡澳门交涉史料. 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 汤开建. 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1999; 金国平. 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 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 万明. 中葡早期关系史.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 张铠. 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 河南:大象出版社,2003.

[2] José María González, O. P. 编写的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en China* (1964—1966) 第五卷 Bibliografías (Madrid) 387 页宣称高母羡的 *Lingua Sinica* 是外国人编写的第一部中文语法书。

[3] 高田时雄文中翻译了封面的献词:“汉西辞典。这是耶稣会士彼得·齐瑞诺神父通过与在菲律宾有超过四万人居民的中国人的会话学到的语言,谨将本书献给彼得·齐瑞诺本人所尊敬的祭司司事犹下。1604 年 4 月 30 日。”高田时雄判断这部词典编纂于 1595—1599 年,见:高田时雄. SANGLEY 语研究的一种资料——彼得·齐瑞诺的《汉西辞典》. 载:陈益源主编. 2009 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南市, 2009:663—671; 意大利马西尼认为这部词典编写于“1595 到 1602 年间”,见: Federico Masini. Chinese Dictionaries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 Xiaoxin Wu (ed). *Encounters and Dialogue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2005:184.

[4] “神父们利用这段时间编了一部中文字典。他们也编了一套中文发音表,这对后来传教士们学习中文有很大的帮助……神父们决定,以后用罗马拼音时,大家一律利用这五种符号,为了一致,利玛窦下令,以后大家都要遵守,不可像过去那样,每个人一种写法,造成混乱。用这种拼音法现在编的字典,以及以后还要编的其他字典可以使每位传教者,都能一目了然。”见:利玛窦. 中国传教史. 刘俊余,王玉川译. 台湾:光启社,1986:286—287.

[5] 方豪提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曾购入《中葡字典》抄本一种,不署撰人姓氏,亦无序,大约作于顺治十七年(1660)或次年,原为意人罗士(C. Ros)所藏。编目为 22.658。此字典附有七十七位耶稣会士中西姓名等。”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117 页。笔者在国图查看了 this 抄本,是一部 6.7 厘米宽,10.2 厘米长的袖珍抄本。词典后附

录有一个从 1624—1688 年的中国纪年表,一个从 1581 罗明坚至 1659 白乃心共 75 位入华耶稣会士名录,16 位中国耶稣会士名录。这个抄本词典中许多基本汉语词汇“腕、腹、肾、脏”都没有葡萄牙文对译词,与罗明坚、利玛窦的《葡汉词典》的重要特点不符,因此笔者判断,国家图书馆的这部汉葡词典不可能是利玛窦的汉葡词典,而是成书于 17 世纪中后期的一部词典。

[6] 高柏(Koos Kuiper)原文“The earliest monument of Dutch Sinological studies: Justus Heumiu’s manuscript Dutch-Chinese dictionary and Chinese-Latin *Compendium Doctrinae Christianae etc.* (Batavia 1628)”刊登在荷兰莱顿 Quarendo. 35/1—2. Brill Leiden, 2005:109—139. 笔者已获莱顿博睿出版社中译版权,中译文《荷兰汉学研究的首座丰碑——赫尔尼俄斯的手稿荷—拉—汉词典与汉—拉〈基督教概要〉》将在《国际汉学》第 22 期刊登。

#### 参考文献

1. Collison R. *A History of Foreign-Language Dictionaries*. London: André Deutsch Limited, 1982.
2. Van der Loon P.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Asia Major New Series XII, XIII*.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66—1967).
3. Streit R (ed). *Bibliotheca Missionum V: Asiatische Missionsliteratur 1600—1699*. Verlag: Franziskus Xaverius Missionsverein Zentrale in Aachen, 1929:311.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责任编辑 王慧敏)